

孫中山在澳港臺及太平洋地區的革命活動及其影響

陳 炎*

中國位於太平洋西岸，是亞洲太平洋（以下簡稱亞太）地區人口最多、面積最大、物產富饒、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的祖先為了這一地區的共同繁榮，曾經開拓了海上“絲綢之路”，並通過這條海上大動脈，與太平洋地區各族人民發生了友好往來和政治、經濟、文化的相互交流，從而對促進人類歷史和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偉大的貢獻。⁽¹⁾到了近代，由於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而亞太地區各國，除了日本幾乎也都先後淪為殖民地，各族人民過舛暗無天日的悲慘生活。東方已經失去了舊世界，但還未獲得新世界，然而峰迴路轉，一個新的東方也正在絕處萌生。恩格斯早在1857年就預言，不要多久，就會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²⁾。果然不出他所料，九年以後，在古老的中國升起了一顆東方的啟明星，照亮了整個太平洋，點燃了這一地區的革命火種。他就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孫中山先生。

孫中山不僅是近代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同時也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他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僅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而且也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震撼了東方世界，促進了“亞洲的覺醒”，鼓舞了正在亞太地區為民族解放而鬥爭的人民，推動了這一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不斷高漲。因此，它在中國和世界近代史中都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孫中山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不僅為祖國的獨立和民族的解放獻出了全部心血，貢獻了寶貴的一生，而且還滿腔熱誠地對太平洋地區各兄弟鄰邦和弱小民族，寄以極大的關注，予以無私的援助。他高瞻遠矚，立足神州，放眼世界，充份表達了偉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的寬廣胸懷和恢弘氣概。因此，他被列甯譽為“亞洲人向奴自由與光明奮鬥的領導者”。⁽³⁾

另一方面，太平洋地區各族人民的反帝民族解放鬥爭和對他的支持和援助，也給孫中山以莫大的鼓舞。太平洋地區是孫中山萌發革命思想的發軔地；太平洋地區是孫中山創建革命組織和領導革命活動的海外基地，太平洋地區又是華僑最多的集中地區，孫中山的革命思想首先為這一地區華僑所接受，然後又通過他們在各地廣為傳播而產生了重大影響。華僑不僅為祖國革命慷慨捐輸，而且投身革命，甚至為國捐軀。因此，孫中山譽稱“華僑為革命之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太平洋地區也是孫中山革命力量的源泉。

孫中山與太平洋的關係既然如此密切，又如此重要，但迄今為止，國內外對孫中山研究的著作雖如汗牛充棟，而對這一論題的系統研究卻缺墨不多。因此對這一論題的深入探討，無疑是有學術價值和十分重要的。

*陳炎（1916-），北京大學東方學系教授兼亞太研究中心研究員，雲南省社科院兼職研究員，中國東南亞研究會顧問，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太平洋歷史學會、中國海上交通史研究會、孫中山研究會理事，中國研究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的著名專家，曾獲多倫多大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表揚證書和北京大學首屆科研成果獎和榮譽證書。

太平洋地區是孫中山 萌發革命思想的發軔地

孫中山誕生於1866年11月12日，距太平天國中央政權覆亡不過兩年。而他的出生地香山縣（今中山市），又與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的故鄉花縣鄰近，因此，在他童年時代，就有機會接觸到太平軍的老戰士。據他自己說：“革命之最初動機，則予在幼年時代與鄉關宿老談話時已起。宿老者誰？太平天國軍中殘敗之老英雄是也。”⁽⁴⁾可見太平天國起義英雄的光輝業績，在孫中山童稚的心田里，早就埋下了革命的種子。

孫中山的故鄉翠亨村，地處珠江口西側，毗鄰澳門、香港，直通浩瀚的太平洋，與海外交通便捷，出洋謀生者頗多。他又出身於窮苦的華僑家庭，父親、叔父和其兄孫眉曾先後在澳門、美國和檀香山謀生。他七歲就下田勞動，常吃不上米飯，以白薯為主糧。這種環境，使他對勞動人民的疾苦，有著深刻的瞭解和同情。這對他後來革命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

1878年5月，他才十二歲就隨母親經澳門、香港，橫渡太平洋到檀香山投靠其兄孫眉，並在當地學校讀書。這次出國開闊了他的眼界，對他的思想發展起了積極的影響。正如他自己所說：“始見輪舟之寄，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⁵⁾這是他第一次經歷太平洋，也是他接觸到新世界和新思想的開始。他旅居檀香山五年，系統地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教育。這使本來在家鄉受到私塾封建教育不多的孫中山大開茅塞。正如他後來回憶說：“憶吾幼年，從學村塾，僅識‘之乎’。不數年得至檀香山，就傳西學，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課暇，輒與同國同學數人互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胞之願，於是乎生。當時所懷，一若必使我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者。”⁽⁶⁾這是他萌發學習西方，來“改良祖國”和“拯救同胞”維新改良思想的開始。當時夏威夷群島的人民正在進行反抗美國侵略的鬥爭，也對他產

生了影響。正如陳少白說：“那時美國常常想把夏威夷群島合併。夏威夷群島的人民就天天在那裡反抗。僑民看慣了這種事，當然更大受影響，尤其是抱有革命思想的孫先生。”⁽⁷⁾可見，夏威夷人民的鬥爭，對青少年時代的孫中山是有所啟發的。

孫中山在檀香山學習五年後，於1883年初回國。回國後，重新接觸到滿清封建統治下的政權，更加感到不滿。不久去香港，先後就讀於香港拔萃書室、中央書院和雅麗氏（Alice）醫院附設的西醫書院。他在中央書院讀書時，正遇中法戰爭爆發。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工人都為反對法國侵略進行罷工，特別是中國軍隊在諒山大捷，法軍大敗時，而李鴻章卻在天津向法國求和，簽訂了賣國條約。這使他對清政府賣國的真相看得更加清楚。民族的災難，屈辱的條約，深深地刺激了他，使他開始萌發反清的意念。正如他後來回憶說：“予自己酉(1885)中法戰敗之年，始決覆清廷創民國之志。”⁽⁸⁾1887年他轉入香港西醫書院後，就與陳少白、尤列、楊鶴齡三人，經常議論時政，揭露滿清腐敗，闡述革命抱負，被時人視為“四大寇”。這就是他說的：“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⁹⁾這時他的革命思想雖已初步形成，但祇是停留在談論革命，還沒有實際地從事革命的活動。他自己也承認祇是處於“革命言論之時代”。⁽¹⁰⁾當時改良主義的思潮在香港盛行，孫中山也常受到改良主義者何啟（他的老師）、鄭觀應等人的影響。因此，他一方面鼓吹革命，另一方面也還對清政府抱有幻想，想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看看這條道路是否能行得通？1894年他上書李鴻章就是在這種矛盾心理下提出的。他提出了要“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主張，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有進步意義的。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裡，企圖靠封建統治者自上而下來實現這些主張，祇能是幻想。他遭拒後，幻想撲滅，才“決心反清，其志益堅”。這是孫中山早期思想由改良主義發展為革命主義的轉折點。上書失敗後，孫中山重新出國去檀香山。這次出國的目的很明確，是為了“擬向舊日親友集資回國，實行反清復漢之義舉。”⁽¹¹⁾

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創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第一個政治團體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目標。但由於會員中成份複雜，還沒有真正形成戰鬥的核心。1895年3月中日甲午戰爭，以中國的失敗告終。清政府被迫又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¹²⁾這時孫中山又立刻從檀香山趕回香港，準備利用這一大好時機，在廣州發動起義。到香港後，他首先成立興中會總會，使它成為民主革命派真正的戰鬥核心和真正的革命指揮部，以便領導廣州的武裝起義。同時他把檀香山興中會章程中的一些溫和詞句統統刪去，並加上：“無論中外各國人士，倘有益世，肯為中國盡力，皆得收入會中。”⁽¹³⁾因此，從興中會到後來的同盟會中都吸收了不少各國的革命志士，一直到臨終前，在他的遺囑中，還總結了他的四十年革命經驗“必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反映了在孫中山的思想中，始終把中國革命同各被壓迫民族的革命聯繫在一起，特別是同亞太地區各族人民在反帝鬥爭中，結成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戰友。孫中山的這一革命思想，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它既不同於太平天國的農民領袖洪秀全等人想當皇帝的思想，又不同於康、梁的保皇維新改良思想，也不同於資產階級舊民主革命中某些狹隘民族主義者的思想。這就是他的偉大之處。正因為孫中山有這種進步的思想，才有可能使孫中山在他晚年時，開始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思想轉變，也才有可能在海外得到華僑和國際友人的支持和援助，並以太平洋地區作為他建立革命組織和領導革命活動的基地。

綜上所述，從孫中山的家庭出身，青少年時期所處的環境，所受的教育和他親自經歷的重大事件，無不與太平洋地區有密切的聯繫。是太平洋第一次給他開闊了眼界；是夏威夷人民的反美鬥爭給他以啟迪；是在檀香山和香港所受的西方教育，使他產生民主共和的思想，特別是帝國主義侵略太平洋各國，爆發了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和美國侵略菲律賓的戰爭，使他下決心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

路，所有這一切都足以說明太平洋地區是他萌發革命思想的發軔地。

太平洋地區是孫中山創建革命組織和領導革命活動的海外基地

孫中山在太平洋地區的革命活動範圍很廣，幾乎遍及太平洋各地，難於一一詳述。今就他的主要活動地區，按年代次序分述如下：

一、澳門——當時已為葡澳當局所佔，清政府無法在澳門行使國家主權。所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便利用這一特殊的地理條件，以澳門作為他的革命組織和革命活動的始發地。

1) 孫中山在澳門的早期革命活動：孫中山的家鄉香山縣翠亨村離澳門祇有37公里，其父又曾在澳門謀生，所以他少年時代常隨父去澳門，對當地情況十分瞭解。1887年，他就讀於香港西醫書院後，澳門更是他往返於香港與翠亨村的必經之地。那時他的革命思想已經初步形成，常與志同道合的好友陳少白、尤列和楊鶴齡一起，非談革命無以為歡，故時人皆稱他們為“四大寇”。1892年秋，他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便應聘於澳門鏡湖醫院，成為澳門的第一位華人西醫。“他以醫術為入世之媒”，一面為貧苦民眾治病贈藥；一面秘密地在居民中傳播革命火種。1892年在澳門《濠頭月刊》上刊出他致香山縣退職官員鄭藻如的書函，主張效仿西方進行改良的思想，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孫中山最早的政治主張。由於孫中山在澳門活動，陸皓東、楊鶴齡、楊心如等革命同志常來澳門與孫中山暢談時政，策劃革命，澳門一時成為革命志士最早的活動據點。惜當時風氣未開，孫中山未在澳門物色熱心革命的同志，甚至連他的摯友兼鉅商何連光也不贊成他的“激烈”主張。由於受葡醫的排擠，他被迫1893年春遷居廣州。但他仍未停止在澳門的革命活動。他與葡人飛南第（Francisco H. Fernandes）等人合作創辦的《鏡海叢報》，於1893年7月18日在澳門創刊。該報有中、葡兩種文版，除報道國內外新聞外，還刊載了孫中山撰寫的〈農學會序〉等宣傳

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思想的文章和報道革命黨人的一些活動，成為近代中國第一份與資產階級革命派有密切關係的報刊。

從1895年起，革命黨人一直以香港為華南的活動中心。不久，澳門則長期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重要基地。但是革命黨人仍利用澳門的特殊地位，把它作為秘密出入內地的孔道。例如，在1895年10月廣州“重九起義”失敗時，起義的領導人孫中山、陳少白等都通過澳門撤往香港；1900年10月史堅如烈士於謀炸兩廣總督德壽之舉失敗後，也準備退往澳門，但不幸在開往澳門輪船的碼頭上被清兵逮捕。1903年1月，興中會會員謝纘泰、李紀堂、洪全福等，去組織廣州起義時，也決定假道澳門。

2) 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澳門的革命活動：從1903年起，改良派在澳門的聲勢開始削弱，革命黨人就積極開展對澳門民眾的革命宣傳，對當地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後，孫中山即派馮自由、李自重在香港、廣州、澳門等地“聯絡同志”發展組織。1906年，馮自由擔任香港同盟會分會會長後，先後派劉樾航、阮亦周、劉思復等前往澳門發展會員。劉、阮等在荷蘭園和隆街21號設立機關，對外稱“樂群書室”，積極開展工作。劉思復還曾在這所房屋內為革命活動試製炸藥、炸彈。這時，同盟會會員們也加強了對澳門民眾的革命宣傳。黃世仲以香港報界記者身份組“優天影粵劇團”，長期在澳門演出，表面上以勸戒煙、賭、纏足等為主題，實則暗寓革命宣傳的時裝新戲，大受澳門群眾的歡迎。他撰寫的反清小說《洪秀全演義》在香港《有所謂報》等報刊連載後，更是風行一時，在澳門幾乎家喻戶曉。由於當時改良派竭力參與革命的為數不多，1907年劉樾航等不得不暫時停止澳門的發展組織工作。兩年以後，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同盟會在香港設南方支部，專門負責港澳兩地會務。這樣，澳門的同盟會再次展開活動。同年冬，澳門正式成立同盟會分會，會長由香港分會會長謝伯英兼任。他們在白馬行街釣魚台一座三層大樓內設立了“濠境閱書報社”，公開徵求社員，在社員中秘密

發展同盟會員。同時，該會重視發展革命武裝，吸收香山縣著名綠林頭目梁義加入同盟會，使他手下的武裝為革命所用。他們成功地策反了來往於前山一帶的“廣福”兵輪的人員，利用這艘兵輪掩護了同盟會的革命活動。經過同盟會分會的長期努力，到辛亥革命前夕，澳門的民眾大多從改良轉向革命，不少熱血青年和男女學生，都加入了同盟會。

澳門此時也像全國其他許多城市一樣，正在組織武裝起義，澳門同盟會將策動香山起義作為首要任務。他們分工負責，策動清軍起義，由新任分會會長林君復與莫紀彭等負責策動駐在前山的新軍，由鄭彼岸等負責運動駐在香山縣城的防營、團練。經過周密的準備，香山起義於11月2日在小欖發動。11月5日前山新軍與縣城一帶團勇等又同時起義，就於當天光復香山縣城。香山起義的成功，鼓舞了廣東省的革命黨人，加速了滿清政權在廣東反動統治的崩潰。三天後，廣州也告光復。隨後，以前山新軍為主體的香山起義軍改編為“香軍”。不久，香軍編入廣東北伐軍，同時有不少澳門的女同盟會員，如許繼魂、陳秉娜、梁國體、嚴淑姬、梁荃芳、梁雪軍……也加入了廣東省女子北伐隊，經南京一直進抵徐州前線。

辛亥革命後，澳門革命活動進入了新的高潮。同盟會分會曾在清平戲院召開有千餘人參加的剪辮大會，各界人士曾以鏡湖醫院名義向廣東革命政府捐輸數萬元的鉅款。可惜，革命確實很快被北洋軍閥袁世凱竊取，使澳門的革命活動，一度走向低潮。

1912年當孫中山擔任全國鐵路督辦的時候，曾取道澳門返回闊別十七年的故鄉。他曾在澳門逗留三天，受到中葡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1913年，宋教仁被袁世凱指使的特務暗殺，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人，決定討伐袁世凱。為了防止袁的爪牙迫害其家屬，孫中山便令髮妻盧慕貞等人入居澳門。同年六月中下旬，孫中山再次到澳門等地召集討袁力量，在澳門約廣東省長陳炯明在軍艦上會面，促使陳同意“四省獨立，廣東同時宣佈”的計劃。

討袁失敗後，袁世凱爪牙龍濟光取代國民黨

人，出任廣東省都督，使廣東陷入血腥的恐怖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同盟會會員、會黨領袖、反袁的革命人士，其中有孫中山的胞兄孫眉、老同盟會員黃明堂、出版反袁刊物《晦鳴錄》的無政府主義首領劉思復等人都祇得遷居澳門。此時，集結於澳門的同盟會員，雖然人數不少，但因當地的同盟會組織早已無形解體，他們缺乏組織，未能積極開展活動，祇有劉思復等無政府主義者較為活躍，他們改《晦鳴錄》為《民聲》，繼續出版發行，在國內外產生很大影響。

廣東省總督龍濟光發現反袁人士紛紛避居澳門，除通過外交渠道，迫使劉思復於1914年初離開澳門外，還加緊拉攏澳葡當局，派遣大批密探入澳門，對在澳門的大批反袁人士加以迫害。密探們偵知黃明堂後，即誣他為匪首，帶領葡方警察將他逮捕，並圖加以殺害，倖得孫中山及時獲悉，多方設法營救，被囚一年多後，最終被釋。這時，是澳門革命黨人的革命活動最為低落時期。

3) 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在澳門的革命活動：1914年6月22日孫中山在日本組織的中華革命黨，在東京召開第一次大會，他被選為總理。這時，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人便將澳門作為討伐袁世凱及其黨羽的前哨陣地。鑒於龍濟光是袁世凱的心腹、革命的大敵，他就委派李海雲、鄧鏗等返回廣東，發動討龍之役，作為討袁革命的重要一環。老同盟會員朱執信出於同樣的目的，也於此時返回廣東。經朱執信與李海雲、鄧鏗的共同部署，林景雲等人以澳門為據點，積極策動香山的駐軍、綠林發動起義。同年底，革命軍率先在惠州起義後，在澳門活動的革命黨人準備立即呼應。可惜他們的負責人陳景桓，因“炸藥案”在香港被捕，林景雲也因有同志在製造炸藥時失事身亡而被澳葡逮捕，起事因而推遲。林景雲獲釋後，要求香山駐軍配合正在進攻佛山的革命軍，但因龍濟光的發動反攻，各地革命軍陸續失敗，而未能成功。經歷這番挫折後，朱執信入居澳門，決定利用當地的特殊條件，進行長期的起義準備工作。朱執信的到來，使澳門的老同盟會會員們歡欣鼓舞，他們團結在朱執

信的周圍，滿懷熱情地投入討龍之役。從此澳門又成為孫中山革命黨人討龍的基地。

1915年2月11日，孫中山胞兄孫眉，病逝於澳門。這時，袁世凱復辟封建帝制的野心暴露無遺，連一度追隨他的梁啟超也與他分道揚鑣，於同年八月發表著名的〈異者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這篇文章在澳門的民眾中激起很大的反響。接著梁啟超系統的徐勤等人也在香港、澳門等地活動，組織廣東各地的討袁武裝。鑒於這種新的形勢，朱執信於同年11月初，專程前往日本東京，與孫中山討論如何在廣東進一步開展反袁鬥爭的問題。朱執信加入了中華革命黨，被孫中山任命為中華革命軍廣東司令長官，負責廣東方面的軍事。此後，他得到孫中山撥給的大批經費，由張發奎、薛岳、李揚敬等人協助，在澳門秘密設立了討龍軍事指揮部，進行發動武裝起義的各種準備，並積極發展中華革命黨組織，從原來的同盟會員中，發展了大批新黨員。

1915年12月25日，蔡鍔等人宣佈雲南獨立；護國戰爭爆發。1916年1月，雲南護國軍的一路指向廣西，龍濟光不得不派主力部隊前去堵截。朱執信就抓住這一大好戰機，率領中華革命軍接連發動起義。在惠州發動起義受挫後，他又發動廣東附近的各縣民軍於2月9日分三路進攻廣州。其中一路由澳門的同志組成。他們的任務是沿增城、羅崗、龍眼洞等處，進襲廣州小北門，進而與另兩路會師，控制廣州全城。可惜，起義消息先期洩漏，龍濟光急調精兵進行鎮壓，起義軍再次失敗。起義軍雖兩次受挫，但已沉重打擊了龍濟光的反動統治。這時，袁世凱為增援廣州，遂令駐上海的“肇和”號軍艦駛往廣州。朱執信便策劃了“劫奪”該艦的計劃，執行這一計劃的有楊虎、馬伯麟、孫祥夫等人，還有陳策率領的十餘名華僑組成的敢死隊。敢死隊冒充乘客從澳門搭乘開往廣州的“永固”號渡輪。在駛近黃埔時，他們以武力劫持渡輪，然而水流太急，無法靠近敵艦，反被艦上的哨兵發覺開炮轟擊。結果，僅有少數人幸免於難，其餘不是犧牲，就是被捕。在屢遭失敗後，朱執信仍不氣餒。在此期間，他與陳炯明在澳門就統一軍事指揮等問題，

進行了多次會談，並在黨人的支持下，繼續堅持鬥爭。三月底，他終於成功地發動了欽、潮、汕等地駐軍的起義。接狹，這支中華革命軍與徐勤率領的廣東護國軍一起，發動了對廣州的會攻。6月6日，袁世凱在四面楚歌聲中死去。龍濟光不久被迫率領殘部逃往海南島。這樣，澳門在廣東討龍之役的勝利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此後，革命黨人在廣東內地已經有了立足之地，可以在這些地區公開活動。因此，祇是桂系軍閥盤踞廣州期間，孫科曾奉其父孫中山之命，以特派員身份在澳門設辦事處，策動廣東的海陸軍起義外，再沒有在澳門進行重要活動。特別是在廣州成為大革命的根據地後，更沒有利用澳門進行秘密活動的必要。澳門至此已經完成了孫中山領導的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和歷史任務。⁽¹⁴⁾

二、香港——鄰近孫中山的故鄉，因其地位特殊，不受清政府勢力的控制，又是通往太平洋地區與海外華僑聯繫的海港，遂成為孫中山組織和宣傳革命以及策動和指揮起義的重要基地。

孫中山在香港的革命活動，主要可概括為以下三個時期：

1) 醞釀反清革命：孫中山於1878年5月第一次途經香港隨母去檀香山。從1883-1886年，他曾先後在香港拔萃書室、中央書院讀書。這一期間，適逢中法戰爭，清廷之昏聩誤國，香港工商界為反對法國侵略的罷工罷市等愛國行動，激發“他救國救民之心”。在香港所受的教育，使他瞭解到西方人民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奮鬥的歷程。這一切對他革命思想的產生都有重大影響。1887-1892年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這個時期正介於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兩大歷史事件之間，由於他受到民族危機的刺激和改革思想的影響，他把讀書與救國乃至與反清革命聯繫起來，同時在學業上接受了西方近代醫學教育，培養了他重科學重實驗的觀念。在政治思想上，他又深受當時在香港出版的中英文各類書籍報刊如《德臣西報》(China Mail)，和提倡改良的《華字日報》等的影響。特別是何啟的改良政論，喚起了他對政治的關心，使他對中國問題有較深的

認識。同時他結識了一群與他背景相同的新知識青年，聚談國事，產生了比較激進的政治抱負。所以他一方面上書鄭藻如提出改良方案(是他後來上書李鴻章的初稿)；而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以“四大寇”為核心的小集團，高談革命開始醞釀反清革命活動。

2) 反清革命活動：香港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中心——廣州，交通便利，加上其政治地位和社會結構特殊，在1895-1911年期間，在孫中山所領導的反清革命活動中，佔有重要的地位。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之後，接著1895年2月就在香港成立了興中會總會，並與以楊衢雲為首的輔仁文社中的革命志士結合在一起，同年十月以香港為主要策劃的基地，在廣州發動了第一次起義。起義失敗後，他被迫離港，但在以後的革命活動中，仍繼續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自1895-1911年，以香港為策動基地的起義，先後達七次之多。香港還是他建立革命組織和進行革命宣傳的中心，1905年在港成立同盟會支部，不但出版同盟會的機關報《中國日報》，甚至創辦學校如光漢學校、實踐女校等均為同盟會宣傳革命和進行軍事訓練之所。同時，香港又以其自由港及貿易中心的地位，就成為革命黨人在商業交易如“和記棧”(革命地下機關)的掩護下，進行偷運武器和收集、交付革命經費等活動之地。此外，香港也為國內及海外革命分子集會的合適地點，也成為起義失敗後，逃亡者的匿居之所。孫中山在香港成立的興中會總會及後來的同盟會都是領導和推動這些活動的重要組織。它的參與者和支持者不但有香港各界人士，而且還有許多來自太平洋地區各國的華僑和從事革命的國際友人。他們都是本狹熱愛祖國或關心中國革命而積極支持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活動的。

3) 辛亥革命以後：孫中山不論在革命低潮時期，還是在革命走向勝利的年代，都非常重視繼續發揮香港的特殊作用。當他辭去南京臨時大總統後，到處宣講民主主義和實業建設時，就到過港澳地區，會見當地人士。為對抗袁世凱的帝制運動，他又命香港中華革命黨機關，組織廣東各地的反袁

運動；當新軍閥陳炯明叛變後，他又指示革命黨人成立“駐港辦事處”組織討陳行動。孫中山直到1923年2月經香港重返廣州建立革命政權，1924年11月為“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他最後一次經香港北上時，還一再勉勵港澳各界人士，為改造中國、振興中華而共同奮鬥。

三、台灣——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也是孫中山在太平洋地區傳播革命種籽較早的地區之一。但是它當時已被日本佔領，還處在日本的統治之下。台灣同胞強烈要求參加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以便早日擺脫日本的統治，回到祖國的懷抱。

1895年，孫中山和楊衢雲、陳少白等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部後，隨即派員分赴各地發展組織。1897年，陳少白就在台北吸收成員，建立興中會台灣分會。

1900年，孫中山看到義和團運動在北方各地蓬勃發展，決定乘此時機發動了廣東惠州起義。台灣與廣東隔海相望，為了就近指揮起義，他於9月25日親自從日本到基隆，在台北成立了起義指揮中心，並派隨同他一起來台灣的日本革命同志山田良政，由台灣去惠州為他傳達命令。後來由於日本政局發生變化，新任首相伊藤博文不准台灣總督與中國革命黨人繼續接觸，孫中山不得已於11月10日由基隆返回日本。惠州起義失敗，山田良政也在起義中犧牲。

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台灣近代著名詩人丘逢甲，代表台灣同胞參加了孫中山在南京的總統就職典禮。1913年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於8月4日離福州去日本，取道台灣時，曾下榻台北御成町“梅屋敷”。1918年，孫中山辭去大元帥職務後，又於6月1日離廣州經廈門，再次取道台灣進行革命活動。當年孫中山居住過的“梅屋敷”，現已成為台灣同胞紀念孫中山的國父史蹟紀念館。1981年，因台北興建地鐵，該館已重新遷建。新的紀念館現已建築宏偉，風景優美。⁽¹⁵⁾它和大陸的南京中山陵一樣，都是海峽兩岸炎黃子孫瞻仰這位對中國革命作出偉大貢獻的革命先驅，表示共同的懷念和敬意的名勝地！

四、檀香山——1878年孫中山第一次到檀香山投靠其兄孫眉。自1878年至1883年他旅檀五年，特別是就讀於意奧蘭尼學校(Iolani School)和奧阿厚書院(Oahu College)期間，首次接觸到西方近代文明生活、政治制度、思想和科學知識，萌發了學習西方，“改良祖國，拯救同胞”之願。此後孫中山又先後六次赴檀。他從少年時代起就在華僑社會中生活，因此瞭解到檀香山華僑的具體政治經歷：

1) 他們曾積極投身反對美國侵略夏威夷的鬥爭，曾參加當地反美武裝起義，而當1893年一批美裔居民發動廢除君主制政變，美國加緊推行吞併夏威夷的計劃時，又秘密參與了謀求被廢黜女王復位的政治運動；

2) 他們還堅決反對美國排華暴行，早年曾組織“保安局”、“聯衛會”等自衛團體，對美國殖民者進行鬥爭；

3) 後來他們從報上得悉清軍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潰敗，更使他們對祖國的衰弱和嚴重的民族危機，深為擔憂，對清朝的腐敗統治深表不滿，強烈希望中國能強盛起來。因此，他們有要求革命的願望。

孫中山之所以首先到檀進行革命活動並籌建興中會，就是通過這部份華僑中像何寬等知識分子，作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

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創建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革命小團體興中會，明確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第一次向中國人民提出推翻滿清政府，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革命主張。

1903年，孫中山改組了旅檀華僑程蔚南辦的商業報紙《檀山新報》，使它成為康、梁保皇派公開論戰的喉舌。在這場鬥爭中，孫中山明確提出：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兩立。”此時他的思想已經與上書李鴻章時所帶有的某些維新改良思想決裂，充份表現出他鮮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場。1903年12月他又在檀《隆記報》上發表了〈駁保皇報書〉，駁斥保皇派認為在國內革命必將招致列強瓜分的謬論，指出：“若人心日醒，發奮為雄，大舉革命，一起而倒此殘腐將死之滿清政府，則列國方

欽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窺伺瓜分之事哉？”⁽¹⁶⁾孫中山還為籌集起義用的革命經費，在旅檀華僑中首次發行“軍需債券”。

因此，檀香山就成為孫中山在太平洋地區最早萌發革命思想進行革命活動、成立革命組織的發源地；成為與保皇派公開論戰的第一個海外戰場；成為第一次在愛國華僑中募集革命經費、籌劃武裝起義的海外基地。檀香山與孫中山的革命業績有著密切的關係。檀香山的華僑為中國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五、日本——是孫中山從事革命宣傳和進行革命活動的中心。“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策劃”，自1895-1924年，他先後赴日十五次，居留日本共達八、九年，佔他革命生涯的四分之一以上，在橫濱、東京、神戶、長崎等地無不留下了他的革命足跡。

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第一次赴日。橫濱是他流亡的第一個立足點。1905年8月，他在日本東京聯合興中會、光復會等革命小團體，創立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同盟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創辦了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辛亥革命失敗後，他又於1914年7月在東京建立了中華革命黨，開展武裝討袁的革命活動。他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時，不但團結了旅日華僑和留日學生，而且結識了許多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朝野人士，特別是結交了許多太平洋地區各國民族運動的領導人，如菲律賓的彭西、越南的潘佩珠和緬甸的吳歐德馬等，以及其它國家的革命志士。因此，日本成為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與太平洋地區各國革命之間的橋樑，成為傳播孫中山革命思想和學說的國際中心。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和宋慶齡的婚禮也是在日本舉行的。孫中山對日本人民支持中國革命（如同盟會員宮崎寅藏和惠州起義英勇犧牲的山田良政等）始終懷著感念之情，多次提到日本是他的第二故鄉。

孫中山在逝世前一年（1924）北上時，還專程繞道日本，在神戶發表了〈大亞洲主義〉的演講。這是他為促進中日友好作出的最後一次努力，同時也反映了他晚年思想的偉大轉變。這時他的思想已

經從過去的“聯”日幻想中擺脫出來，轉而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的罪行。他向日本人民指出：“日本究竟做西方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於你們日本人民去詳審慎擇”⁽¹⁷⁾。他“要為一切被壓迫民族打不平”，“要脫離歐洲的束縛，不做歐洲的殖民地，要做亞洲的主人翁”。⁽¹⁸⁾他提醒日本人民要警惕日本帝國主義向鄰國侵略的動向。後來歷史的發展，正如孫中山所指出，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但發動了侵華戰爭，而且還做了歐洲希特勒的鷹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孫中山的這篇光輝演說，不僅在當時是何等及時，何等正確，即使在抗日戰爭勝利已稟半個世紀多的今天，對中日兩國人民警惕日本軍國主義的再次復活也還有它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六、美國，加拿大，古巴——孫中山首先到美洲大陸，是在1896年6月由檀香山至北美宣傳革命。以後又三度赴美，第一次1904年4月自檀赴美再次宣傳革命。鑒於美洲洪門組織有較大的勢力，大多數華僑都加入洪門組織，他為團結美洲華僑反清救國深入洪門組織，重新修訂致公堂章程。他以英文撰寫的〈中國問題的真解決〉於同年10月在紐約出版。第二次1909年11月由英抵美，於次年3月在舊金山建立美洲同盟會總會，籌集革命經費，並創辦同盟會的機關報《少年中國晨報》。第三次他於1911年6月在美國各地將同盟會與致公堂合併，於七月在舊金山成立美洲洪門籌餉局，籌集革命經費。自7月至11月分兩路籌款，他親往美國北部，共籌集美金144,000圓。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幾乎遍及美國各大城市，西起太平洋沿岸的舊金山、西雅圖、委林柏、洛杉磯、芝加哥、聖路易、底特律，東至大西洋沿岸的華盛頓、費城、紐約、波士頓，無不有他的足跡。

孫中山還兩次到加拿大。一次是1897年7月離英赴加宣傳革命；一次是在1911年把美洲同盟會總會與致公堂合併後，二月到加拿大域多利（Victoria）宣傳革命。該地致公堂還將抵押產所得三萬元，悉數急匯香港，供籌備廣州起義之用。他還在溫哥華成立洪門籌餉局，廣泛籌集革命經費。



孫中山雖沒有親自去古巴，但他在美洲的革命活動也影響到古巴。古巴的華僑和革命黨人在孫中山的號召下，積極資助粵軍討伐桂系軍閥的義舉，一次就捐獻餉銀三萬元，受到孫中山的表彰，並派周雍能主持在古巴的革命喉舌《古巴民聲日報》。1921年孫中山還為該報親筆書寫“今之南董”，以勉勵該報對革命作出的貢獻。

美洲的華僑不僅在經濟上為1911年“三·二九”廣州起義（即黃花崗起義），為南京臨時政府和廣州革命政權的建設，乃至為討袁戰爭的開展，踴躍輸捐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而且在軍事上也全力支持孫中山，如組織討袁敢死先鋒隊回國參戰，充份表現了海外華僑的愛國赤誠。再如舊金山李琦庵（同盟會員）立志飛行報國，孫中山去信鼓勵指出：“飛行機習練一事，為吾黨人材之不可無，其為用自有不能預計之處。”⁽¹⁹⁾並答應如籌款成功當另撥十萬元供此用途。芝加哥梅培建議組織飛行隊，並購得飛機六架，於1911年冬運至上海，雖因乏人駕駛，一時未能按計劃實現，但影響巨大。據唐紹儀向孫中山透露，清廷傳聞革命軍有飛機，是使清帝退位的間接原因之一。

七、東南亞——距中國南方的革命中心和最大的海港廣州最近，自古以來與中國有殊傳統的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又是華僑最多、最集中的地區。孫中山利用這一地區的特殊地位，就把它作為在海外從事革命活動的重要基地。他在這一地區從事革命活動的年代，主要是在1900-1911年之間。他曾先後六次到越南、九次到新加坡、四次到馬來亞，兩次到暹羅（今泰國）。1905年他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後，為了就近指揮軍事活動，就從日本轉移到東南亞地區。首先，他於1902年，就在越南河內成立興中會分會。1905年又在西貢成立同盟會分會。1907年在河內成立機關後，就以河內為基地，先後發動了防城之役、鎮南關之役、欽廉上恩之役和河口之役的武裝起義。1906年，孫中山在新加坡成立同盟會分會後，新加坡就成為指揮整個東南亞各地支部發展革命組織，宣傳革命和募集革命經費的中心。他在該地區先後創辦《中興日報》、

《星州晨報》和《新世紀》等革命報刊，作為宣傳革命與保皇黨展開論戰的輿論工具，在團結東南亞地區廣大華僑支援反清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

孫中山又於1910年以馬來亞的檳榔嶼為基地，召集東南亞各地分會的領導骨幹，秘密策劃於1911年在廣州發動起義，即著名的黃花崗戰役。這次起義失敗，七十二位烈士中就有三十一人是華僑，大多為南洋華僑。辛亥革命失敗後，孫中山仍通過各種方式，發動東南亞地區的華僑，不論是在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積極支持國內的革命。

孫中山雖然沒有到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緬甸，但是這些國家都有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組織，進行革命活動。孫中山還在日本會見這些國家的革命志士，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和革命學說，推動了東南亞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的不斷高漲，產生了難以估計的影響。⁽²⁰⁾

八、大洋洲——孫中山雖然沒有親自到過太平洋的大洋洲如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但據曾任澳大利亞《民報》社長的駱介子先生回憶，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也得到澳大利亞、新西蘭及南太平洋各島嶼如巴布亞、新幾內亞、斐濟等地的華僑積極支持和援助。孫中山曾派陳安仁等同志先後在澳大利亞的悉尼、墨爾本、新西蘭的惠靈頓及南太平洋中的斐濟等地建立革命組織，以悉尼為總部，並在悉尼創辦《民報》進行革命宣傳。當時保皇派梁啟超也親自至悉尼利用一家商報宣傳保皇改良，同時華僑致公堂也在悉尼創辦《公報》。於是在悉尼就展開了一場“君主”與“民主”、“改良”與“革命”的大論戰。在論戰中各地華僑受到很大的教育。由於各地華僑支持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因而保皇派徹底失敗。此後，各地僑胞響應孫中山號召，投身革命，踴躍輸捐，為祖國革命作出了鉅大的貢獻。⁽²¹⁾

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和太平洋地區 民族解放運動的相互支持和影響

如上所述，孫中山的革命思想、革命組織和革命活動與太平洋地區的關係是如此密切，那麼，他



所領導的中國革命與太平洋地區民族解放運動也必然會有相互的支持和影響。

一、孫中山和太平洋地區各國革命志士之間的互相支持和影響

1) 日本：孫中山在日本進行革命活動時，結識了許多日本友好人士，其中有許多人十分景慕孫中山，把他看作是中國未來的希望，認為“東洋問題的結局取決於中國的興亡”⁽²²⁾，主張“身處當世應該以中國為根據”⁽²³⁾。因此，他們給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提供了真誠的援助，其中尤以山田良政和宮崎寅藏的事蹟，最為感人。山田良政於1900年在上海認識孫中山，兩人志同道合，結為戰友。不久，山田隨孫中山奔赴台灣。同年九月與中會決定在廣東惠州起義時，山田受孫中山委托，由台灣赴惠州傳達命令，在戰鬥中不幸被清兵逮捕殺害。孫中山為此痛惜萬分，親筆題寫了山田良政君建碑紀念詞：“蓋外國義士為中國共和犧牲者，以君為首。”⁽²⁴⁾

另外一位是宮崎寅藏（亦名宮崎滔天）。他於1897年開始結識了孫中山。兩人一見如故，彼此傾訴各自的革命理想和抱負，作了推心置腹的長談。會見後，宮崎對孫中山的博大胸懷，盛讚不已，說孫中山“實已近天真之境者，彼之思想何其高尚！彼之識見何其卓越！彼之抱負何其遠大！彼之感情何其誠摯！”⁽²⁵⁾於是他下決心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1898年，他親自將孫中山的英文版《倫敦蒙難記》譯成日文發表。1902年又在東京秋山定輔主辦的《二六新聞》上連載了他撰寫的〈三十三年之夢〉，描述了日本人民關切中國革命，敬仰孫中山的深情厚誼。這本書的發表，直接加深了留日中國學生和各國革命志士對孫中山的瞭解。1905年，黃興在長沙起義失敗亡命日本時，曾專訪該書作者宮崎，並經宮崎引薦在東京第一次會見孫中山。宮崎在他的〈清國革命談〉一文中，還詳細記述了這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見，在東京留日學生歡迎孫中山的大會上，曾懇切地向中國革命發誓，他將“傾家以謀中國之革命”。⁽²⁶⁾後來，宮崎畢生追隨孫中山，獻身於中國革命，以他的實際行動，忠誠地實現了他的誓言。

日本人民之所以熱情支持中國革命，首先是由於孫中山偉大的革命理想，在進步的日本人士中激起了共鳴。1897年孫中山第一次會見宮崎時，就向他傾訴了自己將“為支那之蒼生，為亞洲之黃種，為世界之人道”而興起革命軍。⁽²⁷⁾這種遠大抱負，影響了宮崎三兄弟，使他們找到了以中國革命為中心目標，以亞洲乃至世界革命為己任的“支那革命主義”的理想和歸宿，使他們認識到“首先要在中國實行革命，然後用這種力量去改造一個理想的世界”。⁽²⁸⁾以後，宮崎和孫中山“常相往來，其交情不啻膠漆”⁽²⁹⁾。

辛亥革命後，不論是在勝利愜實被袁世凱竊取，孫中山身處逆境之中，還是在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再次流亡到日本時，日本人民不改初衷，繼續支持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對此，孫中山始終感激他們。1923年9月日本發生了關東大地震。孫中山聞訊後，立即致電慰問，並令熊武把四川募集的賑款匯往日本⁽³⁰⁾，援助日本受災人民，以表達中國人民和他本人對日本人民的關懷和友誼。孫中山在日本進行革命活動期間，除與日本各界朋友聯繫外，還結識了不少正在日本活動的亞太地區各國的革命志士。他們之間的革命友誼也是很感人的。

2) 菲律賓：孫中山對美國背信棄義發動侵略菲律賓的戰爭，表示極大的憤慨。1899年他在日本曾與宮崎一起共同發表聲援菲律賓人民的抗美戰爭。菲律賓革命軍派革命委員會書記長彭西到日本購買軍火。孫中山在日本會見了彭西，並瞭解到菲律賓的革命形勢，欣然答應為彭西代購軍火。孫中山曾告訴周圍同志：“初次見面就受到如此重托，我們必須以義相報，給以助力，何況他們的心是和我們一樣呢？”⁽³¹⁾孫中山為菲購買軍火，“經常奔走無虛日”。最後，通過日本友人犬養毅，找到進步黨的中村彌六任購送之責。1899年7月19日買日本船布引丸，為菲律賓第一共和國革命軍運出第一批武器彈藥，不幸船至浙江洋面觸礁沉沒。但孫中山和彭西並未氣餒，又為菲律賓革命軍購得第二批槍械，由於日本政府的嚴密監視，不得輸出。軍火雖未運到菲律賓，但菲律賓革命軍對孫中山的真誠援助，



則表示由衷的感激，聞知中國革命黨人正欲起義，缺乏餉糈、彈藥，乃令彭西饋贈孫中山十萬日元，作為革命的活動經費。據馮自由說：“其實，除此十萬元外，以後尚有所贈。”⁽³²⁾孫中山收到這筆贈款，猶如“雪中送炭”，即派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日報》作為宣傳革命的喉舌，次年又策動惠州的武裝起義。“非人之助款，大有力焉。”⁽³³⁾

當孫中山發動惠州起義，正急需軍火時，彭西已獲菲律賓革命失敗的消息，孫中山幫助菲方買到的第二批軍火，至此已經失去使用的機會，因此，彭西就提出把它先供給中國革命使用。⁽³⁴⁾而孫中山對菲律賓革命也備加關注，並確信：“如果中國革命成功，援菲更加容易，因此借用這批武器來實現自己的宿志。無論對中國，或對菲律賓都是有利的。”⁽³⁵⁾孫中山還有過“親率興中會會員入菲助戰，速其成效。轉餘勢而入支那內地，以起革命軍於中原。”⁽³⁶⁾的設想。後來，菲方願提供的武器和孫中山的設想，雖未能實現，但他仍百折不撓繼續設法對菲律賓進行援助。1900年6月在他離開橫濱時還說：“已將數百人密運菲律賓給他們以各種幫助。”⁽³⁷⁾菲律賓革命軍中確實有不少中國人參戰。如著名的侯寶華將軍（西名José Ignacio Paula）就率領許多華僑參加抗美戰爭。⁽³⁸⁾菲律賓歷史學家蔡德對孫中山的熱情支援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菲律賓人民永遠感激妳中國的恩德——一種不是用鮮血或金錢所能報答的恩德。”⁽³⁹⁾以上事例說明中菲兩國革命者之間，始終患難相助，無分彼此的友好精神是何等感人！

菲律賓人民英勇抵抗西班牙和美國侵略的戰爭，也給孫中山以莫大的鼓舞和影響。他認為菲律賓“能抗拒西班牙和美利堅二大國，以謀獨立而建共和。”⁽⁴⁰⁾就沒有任何理由說“中國不可共和”⁽⁴¹⁾，從而更加強了他的信心，認識到中國同亞太地區各國都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奴役，所以中國的革命必須同亞太地區的反帝民族解放運動聯繫起來，結成風雨同舟的戰友。正如彭西在他的《孫中山——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一書中，在回憶自己與孫中山初次見面時的情況說：“孫中山深切關心菲律賓人民和國

家歷史的發展以及革命的形勢，同時他善於把遠東許多國家出現的問題，綜合起來加以研究。因為他認為這些問題都有許多共同點，而且認為各國人民需要建立相互認識，相互瞭解的關係。因此，在他的影響下，在東京成立了“東方青年協會”。這個協會由來自朝鮮、中國、日本、印度、暹羅（今泰國）和菲律賓的青年學生組成。孫中山是這群青年學生的熱情鼓動者之一。”⁽⁴²⁾可見在孫中山的影響下，中國青年和亞太地區的各國青年，能超越國籍在同一革命組織中，從事革命活動而共同奮鬥！它為亞太地區近代民族運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彭西的著作不是一本普通的傳記，而是中菲革命史上的珍貴文獻，為我們瞭解孫中山的革命事蹟，特別是他對亞太地區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的關注和支持，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從中再次證明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行動都大大超出了中國的範圍，也證明列寧對他評價的正確。

3) 越南：孫中山同越南近代史上的革命先驅潘佩珠的接觸也是在日本開始的。潘氏於1905年為反抗法國的殖民統治而至日本橫濱，這時孫中山也正好從美洲到日本橫濱。潘氏到致和堂拜訪了孫中山，第一次會面，就進行了兩次長時間的筆談。孫中山讀過潘氏的著作《越南亡國史》，知其受我國康、梁的思想影響，主張君主立憲制。在筆談中，他針對潘氏思想“痛斥君主立憲之虛偽”⁽⁴³⁾，主張推翻君主，建立民主共和。而潘氏聽了孫中山的意見後，“亦謂其民主共和政體完全”⁽⁴⁴⁾，但又認為據越南具體情況，還不能馬上實行。兩人的政治主張雖然一時不盡相同，但通過這次會談，加深了中越兩國革命黨人之間的友誼和相互瞭解。從此，越南革命者遇到困難，總是得到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黨人的熱情支持和幫助。正如潘佩珠自述：“其後吾黨窮急時，得借助於彼黨（指孫中山的黨）為多，則亦兩次會談之媒介也”。⁽⁴⁵⁾孫中山在日本時，還多方為潘氏聯繫，協助他培養人材，儲備力量。他鼓勵潘氏提倡越南青年出國赴日本留學，因而興起了越南近代史上的東遊運動。在日本的越南留學的人數很快就發展到二百餘人，以至於一時發



生經費困難。孫中山為留日越南學生積極籌措資金，使他們得以繼續學習。

越南北部同我國雲南、廣西毗鄰，為獲得雲南籍的中國革命黨人對越南革命的支持，孫中山又介紹潘氏與在振武堂學習的雲南學生取得聯繫。潘氏後來又與《雲南雜誌》社的領導人趙珍齋取得聯繫，並出任該社編輯。他以巢南子筆名，寫了〈哀越吊滇〉、〈越亡慘狀〉等許多文章，在揭露法國殖民者在越南的罪行，喚起越南人民的覺醒和獲得國際社會對越南革命的同情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08年潘氏又與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和亞洲其它國家的革命志士一起，組織了“東亞同盟會”。這是一個聯合亞太地區各國被壓迫民族，共同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國際組織。不久，他還與中國留日的雲南、廣西籍學生聯合組織“桂滇越同盟會”。這兩個組織後來雖受帝國主義的禁止而被迫解散，但說明這一時期，在孫中山的影響和幫助下，中越兩國的革命已經發展為有組織的聯合鬥爭，開始具有世界革命的意義。

從1902-1907年，孫中山曾多次到越南進行革命的組織和宣傳工作，曾對“東京義塾”創辦人阮權表示：“中國一旦滅清復漢大事告成，不論越南兄弟需要什麼，中國革命黨人都將給予幫助。”⁽⁴⁶⁾歷史證明中國的革命黨人，後來正如孫中山所說那樣去做的。

1909-1911年，正是越南民族解放運動處於低潮的時期，辛亥革命的勝利使越南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正如維新會領袖潘佩珠在得到勝利消息後說：“此訊（指推翻滿清的武昌起義）一來，余喜獵故態，又怦怦然欲動。”⁽⁴⁷⁾“中華民國之建立，風聲影響，頗及於吾國，吾國民氣復大振，冒險為亡命者，接踵於粵城。”⁽⁴⁸⁾1912年維新會會員阮仲（忠）常從河內到廣州向領導匯報時說：“中華革命（指辛亥革命）成功之風潮，影響於我國甚大。人情激奮，比前大增，在外若無先聲，在內不患無再起之氣勢。”⁽⁴⁹⁾“當時越南人民把越南革命的前途寄托在中國革命的前途上”。⁽⁵⁰⁾辛亥革命以後，越南革命志士紛紛從泰國、越南、日本，“接

踵於粵城”，不久即達百餘人。越南人民領袖胡志明也曾在廣州組織了一個“亞洲被壓迫民族協會”，參加的有越南人、朝鮮人，印度尼西亞人……等等。⁽⁵¹⁾這時廣州不僅是中國革命的中心，也是越南革命的海外根據地。

辛亥革命以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政府為越南革命提供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和更多的幫助，潘佩珠為爭取中國革命政府的援助，1912年2月專程從廣州到南京晉謁孫中山，受到熱情的接見，孫中山邀請他參加第一次臨時參議院會議旁聽，又派黃興與潘氏會談援越問題，以後就有大批越南革命志士入我國各類軍事學校學習。正如潘佩珠回憶說：“若我黨者，入北京士官學校，入廣西陸軍學堂，入廣東軍官學校，教之、養之、保全之，毫無所吝，華人對我，其感情不已厚乎。”⁽⁵²⁾1912年8月在孫中山的支持下，中越兩國的革命者在廣州共同組織了一個援越抗法組織“振華興亞會”，會員迅速發展到二百餘人，由中國的鄧警亞任會長，潘佩珠任副會長。該會宗旨是：“振華興亞，而第一發之炮聲，首先要越南（打響）。大會決定在越南國內組織光復軍發動起義的同時在中國組織援越軍，從邊境突入以策應越南起義的光復軍。”⁽⁵³⁾後來由於形勢變化，援越軍一事未能實現，但從以上史料來看，孫中山對越南革命的無私援助及其影響是史無前例的。

另一方面，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也得到越南人民的支持和援助。孫中山自1902-1907年，曾先後六次到越南進行秘密革命活動。其間幾次受到法國和清政府密探的跟蹤，圖謀暗害，在越南人民的掩護和藏匿之下，才免於難。1907年他在河內設立指揮機構，就以河內為基地，就近策劃防城、鎮南關、欽廉、上恩和河口之役的武裝起義。在鎮南關起義時，還得到越南數百名少數民族的支援。

4) 印尼：印度尼西亞民族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穆罕默德·哈達認為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對印尼的民族解放運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說，印尼的民族主義者對辛亥革命十分羨慕和欽佩。他還在演說中強調：“除了日本勝利（指日俄戰爭）外，



另一個影響就是孫中山領導的1911年推翻滿清政權，創立中華民國的革命。……中國大陸發生的這個偉大事件，喚醒了印尼華僑的民族精神，也激起了印尼人民的革命意識，從而出現了由伊斯蘭聯盟組織起來的最早的民族運動。”⁽⁵⁴⁾此外，印度學者維沙爾·辛格說：“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的統治，引起了印尼華僑的民族覺醒，而印尼民族主義思想的起源，部份是華僑中間新生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反應。”⁽⁵⁵⁾荷蘭學者魯特格爾斯也說：“辛亥革命後，印尼華僑轉而採取肯定印尼民族獨立運動的態度。印尼人民也開始參加有利於中國革命運動的示威遊行。”⁽⁵⁶⁾關於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對印尼民族解放運動的影響，還有不少史料，限於篇幅不再列舉。僅就以上所述，足以說明它對印尼民族解放運動的影響之大。從哈達到印度學者，甚至到荷蘭學者莫不承認華僑在傳播辛亥革命的影響方面，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在這裡我們還必須強調指出，華僑傳播辛亥革命的影響決不祇在印尼一地，幾乎整個太平洋地區的華僑，同印尼華僑一樣，都是辛亥革命的擁護者和傳播者。正是通過華僑的傳播，辛亥革命的影響，才達到太平洋地區的每個角落。

二、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學說對太平洋地區革命領導人的影響。

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學說不僅給中國人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而且在太平洋地區的革命領導人中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今舉幾例說明如下：

印尼民族運動的領袖、共和國的締造者蘇加諾總統說，從1918年開始，他就受孫逸仙“三民主義”的教育。“在三民主義的影響下，深深地樹立了民族主義的思想，認清了世界人道主義是要我消除民族主義的本質。因此，如果說中華民族把孫逸仙當作他們的領導者，那麼，我蘇加諾作為一個印度尼西亞人，也衷心感激孫逸仙博士，直到我進墳墓的那一天。”⁽⁵⁷⁾1956年宋慶齡訪問印尼時，他又對她說：“孫中山先生的學說啟發我去鬥爭，啟發我去愛我的國家，愛我的人民，我同我的人民一道長期鬥爭的結果，終於在1945年爭取到印尼的獨

立。”⁽⁵⁸⁾他在清華大學演說中，再次談到孫中山對他的影響。他說：“我深受到你們的父親孫逸仙博士的鼓舞。在青年時代，我閱讀過三民主義，我不是一次而是兩次、三次、四次，從頭到尾地詳細閱讀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鼓舞了我年輕的靈魂……，後來我年紀大了，變得更成熟了，我把孫逸仙博士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加以綜合，我把三民主義同我精神世界裡所接觸到的偉大人物的理論結合在一起……它不是三民主義，而是五民主義，或是‘潘查拉希’（即印尼建國五基）。”⁽⁵⁹⁾在蘇加諾的演說中還幾次提到“天下為公”和“亞洲是一家”的思想，也無不打上孫中山思想的烙印。正如他本人所說：“亞洲是一家的思想，第一次是從孫中山那裡知道的。”⁽⁶⁰⁾

越南的革命領袖潘佩珠，前面已經提到他在橫濱致和堂與孫中山兩次筆談時，受到孫中山思想的強烈影響。這次會見是潘氏思想發展的重要轉折點。正如他自己所說：“胸中含有一番改弦易轍之動機，則自此始。”⁽⁶¹⁾1912年潘佩珠改組越南維新會為光復會時，終於放棄了君主立憲主張，成為堅定的共和制倡導者。他提出了“驅除法賤、取消君主立憲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綱領。謝諾在他的《越南民族的歷史貢獻》書中寫道：“越南光復會從名稱到綱領莫不”受孫逸仙思想的影響而“具有更鮮明的共和色彩。”⁽⁶²⁾可見這次會見的意義重大，所以潘氏在孫中山逝世時，寫下了這樣一副輓聯：

志在三民，道在三民，憶橫濱致和堂兩度
握談，卓有精神貽後死；

憂以天下，樂以天下，被帝國主義者多年
壓迫，痛分餘淚泣先生。⁽⁶³⁾

它不僅表達了潘氏對孫中山的崇敬和悼念，也說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天下為公”的學說，特別是橫濱致和堂會談的啟發，對潘氏思想有著多麼大的影響！

緬甸民族運動的領袖，愛國僧侶吳歐德馬1907



年為尋求革命真理東渡日本，後經中國留日學生的介紹，會見了孫中山，交談以後深受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啟迪，而孫中山對吳氏卓有見地的看法，也表示讚賞。從此兩位革命家就結為摯友。1909年吳氏應孫中山的邀請，同孫一起到中國參觀訪問。他們在旅途中就今後如何加強兩國共同團結反帝，進一步開展民族運動等問題充份交換了意見。後來吳氏回憶說，這段時間是他一生中最難忘的，也是受孫中山思想影響最深的日子。⁽⁶⁴⁾

吳歐德馬自日本回緬甸後，即投身於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民族解放鬥爭。他以宗教名義組織了緬甸佛教團體總會，公開提出：“克拉多克（英駐緬甸總督）滾回去！”等反帝口號。他還發起“溫達努”（緬文意為“愛國的民族精神”）運動，反對殖民當局的奴化教育，提倡愛國的民族教育，以激發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吳氏提倡的“溫達努”的愛國民族運動，顯然是他把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再結合緬甸本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來的。這種民族主義精神還體現在緬甸德欽黨組織的名稱中。德欽黨的“德欽”這個名詞，緬語為“主人”，寓意“緬甸人是緬甸的主人”。它同孫中山的“亞洲的主人”的思想，如出一轍。德欽黨領導人德欽巴東主編的《書苑》雜誌，曾連續發表〈孫中山——中國革命的領袖〉、〈三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等文章。⁽⁶⁵⁾正如緬甸作家貌貌別所說，當時緬甸的進步青年為尋求革命真理莫不求教於孫中山的學說。⁽⁶⁶⁾1925年3月12日吳歐德馬聞知孫中山病故後，悲痛萬分，並長途跋涉親來北京吊唁和參加葬禮，在中山先生靈前，痛念他同中山先生的友情，三民主義對他思想的啟示和對緬甸革命的影響。他以崇敬的心情，寄托了緬甸人民和他本人的哀思！⁽⁶⁷⁾

泰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黨——民黨的左派領袖比里·帕依榮，也受到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重重大影響。《泰國現代史綱》說：“比里·帕依榮的理論中，有明顯的孫文主義的印記。”如在民黨的政治綱領中，主張推翻君主專制，主要反映了這派受中山思想的影響。但他們不是依靠群眾力量去推翻帝制，而寄希望於政變。結果，右派軍人利用他

的口號和綱領，於1932年6月24日發動政變成功，就出賣了比里·帕依榮，迫使他不得不流亡國外，不久泰國又復辟為君主政體。⁽⁶⁸⁾

以上祇舉受孫中山革命學說影響較深的幾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為什麼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學說能在亞太地區這樣深入人心，產生這樣大的影響？！這是因為：

首先，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其核心就是民族主義，而其主流是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維護民族團結。當時亞太地區各國同中國一樣，都深受帝國主義的奴役和壓迫。因此，孫中山提出的民族主義，主張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團結各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共同反對殖民統治，反對封建君主專制，建立民主共和的這一思想，是順應當時亞太地區民族覺醒的歷史潮流，也是符合亞太地區民族解放運動日益高漲的時代要求的。所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深深地吸引了印尼的蘇加諾、越南的潘佩珠、緬甸的吳歐德馬和泰國的比里·帕依等革命領導人。

其次，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思想，實際上就是聯合亞洲被壓迫民族共同反帝的思想。1924年他在橫濱所作〈大亞洲主義〉的演講，既全面闡述了“要為被壓迫民族打不平”，揭露批判日本軍國主義和霸權主義，閃耀着他晚年思想的光輝。如上所述，蘇加諾的“亞洲是一家”的思想，第一次是從孫中山那裡知道的。1928年他發表的《印度尼西亞與泛亞洲主義》，也提出“亞洲是一家”和強調必須團結反帝的主張，實際上就是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思想的翻版。前面提到越南潘佩珠組織的“東亞同盟會”以及緬甸德欽黨提出的“緬甸人民是緬甸的主人”等政治組織，也無不打上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思想的烙印。

此外，我們還必須指出孫中山的“國共合作”的思想，在亞太地區各國政黨中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孫中山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為中國舊民主革命找到了新的出路。1924年他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其中聯共就是主張國共合作，就是民族



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合作。這一思想也在亞太地區各國政黨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1920年蘇加諾在〈民族主義、伊斯蘭教、馬克思主義〉一文中提出的“納沙貢”，就包含了民族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合作的內容。蘇加諾以孫中山提出的第一次國共合作為“納沙貢”的重要論據之一。⁽⁶⁹⁾1959-1965年他曾實行過“納沙貢”政策，即容許共產黨人參加從中央到地方的立法、諮詢機構和各級政府。又如緬甸從德欽黨到昂山組織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等政治組織，也都是民族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合作的統一陣線組織。再如越南，胡志明（阮愛國）於1941年5月建立的由共產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合作的越南獨立同盟（簡稱越盟）以及1945年以胡志明為首的越盟，聯合越南國民黨等黨派組成的“越南抗戰聯合政府”等等。所有上述這些政治組織，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孫中山國共合作思想的影響。

但是我們在論述孫中山的革命學說對亞太地區各國革命領袖和政黨的影響的同時，也必須指出：由於各國的社會歷史的情況不同，無論是印尼的蘇加諾、緬甸的昂山，還是越南的胡志明，雖然在孫中山國共合作思想的影響下，一度實現了民族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合作，但同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以蘇加諾為例，其言行並不一致，結果1948年9月印尼發生了茉莉芬事件，共產黨終於被鎮壓了。1959-1965年蘇加諾的容共政策，在軍人集團的壓力下，也迫使他不得不以犧牲印尼共來保住他自己。再如緬甸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也在緬甸獨立後不久而分裂，緬共也被宣佈為非法，不得不轉入地下。而越盟的聯合政府也祇是曇花一現。因此，孫中山的“聯”共政策與上述蘇加諾的“納沙貢”有著本質上的不同，與緬甸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和越南的越盟，也不能簡單地劃上等號。因為各國的國情不同，政治活動的時間和空間都不同，特別是孫中山的政治品質更不同於蘇加諾。孫中山之所以偉大，在於他主張的“聯共”政策是真誠的。在政治上，他堅持革命不斷進步，因而得到中國共產黨的信任和支持。

歷史證明：第一次國共合作取得了北伐戰爭的勝利；第二次國共合作又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但在每次國共合作取得勝利之後，又不幸走向分裂。顯然，這也是違背中山先生“國共合作”的理想和期望的。這是歷史的悲劇，也是值得我們總結的經驗教訓。現在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民為了祖國的統一和富強，正在盼望和呼籲國共的第三次合作。為了實現海峽兩岸人民的願望和遵循中山先生的遺志，我們殷切希望第三次的國共合作能早日實現。

綜上所述，孫中山不愧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也是亞太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熱情的支持者和卓越的領導者。他對亞太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給予深切的同情和無私的援助。不論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還是在行動上，都產生過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深遠的。他從反對保皇改良發展到辛亥革命，從舊三民主義發展到新三民主義，從中國革命發展到中國以外的太平洋乃至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他的這種不斷革命、不斷進步的精神，為亞太地區各族人民樹立了榜樣，也推動了這一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不斷高漲。今天，我們高興地看到孫中山先生一生為亞太地區民族解放運動所作出的一切努力，並沒有落空。現在亞太地區國家，大多已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枷鎖，不再是受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這正是中山先生生前所追求的理想。我們中國和亞太地區人民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不能不以萬分感激和崇敬的心情來紀念這位偉大的革命家對中國革命和亞太地區各國革命所作出的貢獻！

【註】

- (1) 拙文：〈略論海上“絲綢之路”〉，《歷史研究》1982年第3期。
-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卷頁22。
- (3) 轉引自李大釗：《守常文集》，1949年版，頁106。
- (4) 引自宮崎寅藏：〈孫逸仙傳〉，載《建國月刊》第五卷第4期。
- (5) 〈覆翟理斯〉函，佚名編《總理遺墨》影印本，頁3。
- (6) 孫中山：〈在廣州嶺南學堂的演講〉，上海《民主報》1912



- 年5月14日。
- (7)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陳少白先生哀思錄》頁93。
- (8)(9)(10)(12)孫文：《革命原起》。
- (11) 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
- (13) 孫文：《香港興中會宣言》。
- (14) 以上資料參考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 (15) 見臺灣《民生報》1986年11月12日。
- (16) 《檀山新報隆記》1903年12月29日。
- (17)(18)孫中山：〈大亞洲主義〉見《總理全集》下卷“演講”頁79。
- (19) 《總理全集》頁521。
- (20) 詳見拙作：〈孫中山對東南亞民族解放運動的影響和貢獻〉，收入《孫中山和他的時代》（孫中山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21) 駱介子：《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回憶光輝業績》一文。
- (22)(23)《宮崎滔天全集》第五卷頁349。
- (24) 同上，第二卷《亡友錄》。
- (25) 同上，第一卷，頁119-120。
- (26) 〈凌容眾日記〉，見毛注青：《黃興年譜》頁53。
- (27)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商務1947年增訂版頁19。
- (28) (日)宮崎龍介：〈先父滔天的一些事跡〉，《三十三年之夢》附錄。
- (29) 轉引自近藤秀樹編、禹昌夏譯：〈宮崎滔天年譜稿〉、《辛亥革命史叢刊》第一輯，頁130。
- (30) 杜永鎮：〈孫中山對日本地震災民的同情與支持〉，載《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4期。
- (31) (日)入江寅次：《明治南進史稿》，1943年東京井田書店，頁204。
- (32)(33)馮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頁77-80。
- (34)(35) (日)葛生能久編：《東亞先覺志士記傳》，1933年黑龍會出版部，上卷，頁648-649。
- (36) 宮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夢》（中譯本），中國研究社版頁68。
- (37) 《孫中山全集》，第一卷〈離橫濱的談話〉，頁188-189。
- (38) 蔡德：《菲律賓政治文化史》，1949年馬尼拉版，第二卷頁222；前揭葛生能久書，頁32；《民報》1906年第9號有一幅侯寶華將軍照片。
- (39) 蔡德前揭書第一卷頁285。
- (40)(41)《總理全集》下卷“演講”頁55。
- (42) (菲)彭西：《孫逸仙——中華民國的締造者》，馬尼拉，1912年。
- (43)(44)(45)(46)(47)(49)(52)(61) 均見《潘佩珠年表》。
- (46) 詳見(越)章牧：〈孫中山與二十世紀初越南革命的關繫〉，《廣州文史資料》第25輯。
- (48) 潘佩珠：《獄中書》原用中文寫成，有日文和越文譯文。
- (50) (越)陳輝燦：〈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轉引楊萬秀〈孫中山對東南亞民族解放運動的影響〉，《廣州研究》，1983年第2期。
- (51) 參閱Tran Dan Tien著，張念式譯《胡志明傳》，上海八月出版社，1949年，頁82。
- (53) 鄧警亞遺稿：〈中越革命志士組織振華興亞會進行抗法鬥爭的回憶〉，《廣州文史資料》第25輯。
- (54) 阿美爾茲：〈佐克羅阿米諾的生平與鬥爭〉，轉引周南京：《華僑、辛亥革命與印尼民族獨立運動》，《華僑史學會通訊》1984年第2期。
- (55) (印度)維沙·辛格：〈印度尼西亞政黨的起源〉，譯文載《東南亞研究資料》1961年第4期。
- (56) (荷蘭)魯特格斯：《印尼民族運動史》，1951年頁7轉引注。
- (54) 周南京文。
- (57) 《蘇加諾演講集》，世界知識社1956年版，頁14。
- (58) 宋慶齡：〈訪問印尼的報告〉，《人民日報》1956年9月27日。
- (59) 見《人民日報》1956年10月5日。
- (60) 同上注(58)
- (61) 同上注(43)
- (62) (法)謝諾：《越南民族的歷史貢獻》，巴黎，1905年，頁189。
- (63) 《潘佩珠年表》；另見潘佩珠：《自我批判》（越文本，其中“橫濱”作“橫津”，“精神”作“真神”）頁78。
- (64) (緬)敏瑞〈吳歐德馬與孫中山〉（緬文），《妙瓦底》雜誌1980年8月號。
- (65) (緬)吳山迎：〈吳歐德馬法師〉（緬文）頁32-33；姚秉彥：〈緬甸紅龍書社〉，載《東南亞》雜誌1984年第4期。
- (66) (緬)貌貌別：〈在考驗中的緬甸〉轉引(蘇)華西里耶夫：《緬甸史綱》（中譯本），1957年商務印書館，頁286。
- (67) 同上注(64)。
- (68) (蘇)尼瓦·列勃里科娃：《泰國現代史綱》（中譯本），商務版頁57；《泰國簡史》，中山大學東亞歷史研究所編，商務版，頁67-71。
- (69) 蘇加諾：《在革命旗幟下》第一卷頁5，轉引自上注(54)周南京文。